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国际友人研究丛书

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 和建设纪年

(1919~1937)

张文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国际友人研究丛书

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纪年

(1919.5.4~1937.7.7)

张文琳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纪年:1919~1937/张文琳著.一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6

(国际友人研究丛书/张文琳主编)

ISBN 978-7-5034-1992-8

I. 国… II. 张… III. ①友好往来 - 外国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②新民主主义革命 - 史料 - 中国③社会主义建设 - 史料 - 中国 IV. K812.6 K2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1779 号

责任编辑:朱 荔

封面设计:李可可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印 刷:金华市浙师教育图文有限公司 邮编:321004

装 订:金华市浙师教育图文有限公司 邮编:321004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1 字数:534 千字

印 数:1000 册

版 次:200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全套定价:36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总序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韩信夫

关于外国友人在中国革命中的活动及其规律与贡献的研究，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的。张文琳老师的《国际友人研究丛书》就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系列著作。

综观全丛书，我认为有以下优点：

首先，是在进行大量前期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从1986年起，张文琳老师就对这一课题展开深入研究，查阅了大量的档案等第一手资料，发表了不少的相关论文，并出版了一部相关的著作。这些研究成果当时在学术界曾产生了比较强烈的反响，如他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中的外国友人”的系列论文，有的被《新华文摘》、《史学年鉴》作了要目，有两篇还被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史》全文转载。还如他出版的《国际友人与红色中国》（群体人物传记）一书，记得人民大学党史系博士生导师彭明教授曾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发表书评，认为：“资料翔实，颇有史料价值”。就史学研究的规律而言，在上述长期积累资料并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撰写的本丛书，其价值应该说非同一般。

其次，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珍贵，考证严密。丛书中涉及的人物，囊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同革命阶段到中国的所有外国友人。这些外国友人有各方面各阶层人士，如军人、政府官员、记者、医护人员等等。对他们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及贡献，丛书中做到了“年谱式”的记述，特别是能看到外国友人作为一个群体，在

总 序

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援助中国革命的整体情况，同时其规律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资料方面，从所列参考文献数百种，其中多半是档案资料即当时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出在资料的挖掘上，也是下了大功夫的。可以说，资料不仅丰富，而且弥足珍贵。当然作者在采用这些资料的时候，也是经过严密考证的，这可从他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论文得到印证，如他曾在《甘肃社会科学》上发表《国际友人在中国革命中若干史实的考证》一文。

第三，填补了学术界研究的空白。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至今尚未有一本哪怕是一般意义上的“通史”性史学著作问世。该丛书填补了这一空白。它最有价值的地方，除了资料外，就是在史学界第一次以时间为经、人物的活动为纬，勾勒了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国友人援助中国革命活动的基本线索和轮廓。这就为这一领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尤其为撰写一部从通史角度研究国际友人的著作，奠定了基础。欣喜的是张文琳老师有关这方面的课题即《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研究》，已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

总之，该丛书的问世可供深入研究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现代史参考。此外，还对广大青少年进行国际主义教育、促进中外人民之间友谊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生动教材。

2007年5月19日于北京

前 言

本丛书关于国际友人的含义,是指在来中国且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曾给予援助即行动上或道义上支持与帮助的外国人。这样的外国人,既有民间的,也有官方的;据统计,革命时期即近 2 万人,其中有名有姓者数百人,重要人物近百人;所从事的职业有政治、军事、文教、科技、艺术等。我们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主要靠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达 20 多年的欲血奋战,付出了巨大牺牲所取得的。但是,也不可否认,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若没有这些国际友人的援助,要取得胜利,那将是很难很难的。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与国际友人的援助分不开的。

然而,对国际友人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以前国外早就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也出版了一些进步人士撰写的有关重要人物的传记及相关著作。在国内,在翻译、出版国外系统资料的基础上,至今出版著作 10 余部,发表各类文章大约 360 篇(期刊)。这些成果较为翔实、全面、系统,但就学术研究言:首先,研究层次比较低:一是著作中传记类书籍多、专题性的研究著述少,如上述国内已出版的这方面的 10 余部著作全部为传记类书籍(有个别评传),特别是从通史角度研究国际友人的专著空白。二是文章中回忆、纪念和记述等类文章多,研究性的论文少,如上述已发表的各类文章约 360 篇中,论文约 140 篇,仅占总数的 39%。其次,研究面比较狭窄:这些为数不多的论文主要集中在重要人物斯诺、白求恩与鲍罗廷、马林、罗易和李德 6 人,共约 110 篇,约占论文总数的 80%。总之,对国际友人的研究还有待于全面系统的

前 言

学术性群体研究。

幸运的是历史赋予了丛书作者关于这一研究的机遇和便利的条件。在长期进行研究,积累较为丰富的资料和成果的基础上,丛书作者于2005年申报的《国际友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研究》(著作)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资助。本丛书即是它的阶段性成果。它由5本书组成,从体例上讲,其中2本是大事记、2本是编年史,还有1本是人物群体传记。从内容来说,大事记、编年史和人物群体传记二者互为关联或补充。人物群体传记从“横”的方面研究、记述和介绍了从1935年红军和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中国革命的“新局面”时期,数十位国际友人在红色区域“西北”及其周边地区援助中国革命的活动与贡献。而大事记、编年史则从“纵”的方面即以时间为经、人物的活动为纬,在中国学术界首次勾勒了1919年五四运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国际友人援助中国革命活动的基本线索和轮廓,同时也全面而系统地提供了关于这一方面的史实。值得指出的是,在提供史实的过程中,既注意到了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又注意到了中国革命对国际友人的影响;对特定时期虽通过国民党政府来华并在国民党政府工作,但对中国革命从事过一些有益的活动者,也不遗忘;对曾帮助中国革命,但因我们政策失误一度长期与我们疏远者,或因与我们产生意见分歧,但非根本反对中国人民者,也不排除。

史学的终极目的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供后人借鉴,而真实地记录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是其第一步,亦即基础性工作。本丛书力求对国际友人的记述、介绍如实,评价客观、公允,同时还力求资料翔实可靠,但由于作者学术水平有限,丛书中错误和疏漏以及不妥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在本丛书的资料收集、撰写与出版过程中,许多图书资料部门

前 言

和学术界同仁给予了帮助。陕西省档案馆、图书馆,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马列教研部资料室,宁夏回族自治区档案馆,宁夏大学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山西省档案馆,甘肃政法学院图书馆,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粤、鄂、陕、甘、宁、晋、冀、鲁等省区中共党史资料征集、政协文史资料研究等部门,为作者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山东省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李肇年先生,翻译家、斯诺夫妇研究学者、陕西省外事办公室安危先生分别提供了他们各自的有关资料。此外,在撰写过程中,较多地参考和利用了期刊和图书网上有关同志编辑出版的资料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韩信夫先生在百忙中作了序。浙江师范大学有关部门和领导,特别是社会科学处处长郑祥福教授给予了热情地鼓励与支持。在此,作者谨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丛书作者 张文琳
2007年5月于浙江金华

目 录

总 序	1
前 言	1
1919 年	1
1920 年	9
1921 年	52
1922 年	72
1923 年	116
1924 年	153
1925 年	189
1926 年	243
1927 年	299
1928 年	369
1929 年	385
1930 年	401
1931 年	424
1932 年	444

目 录

1933 年	474
1934 年	497
1935 年	520
1936 年	551
1937 年	616
主要参考文献	645

1919年

五月

4日 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出卖。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

此前4月11日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下称“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正式成立后，鉴于美国总统威尔森曾许诺“扶植弱小民族”，“尊重民族自决权”，韩国临时政府对此寄予希望，任命国务委员金奎植为全权代表前往巴黎，要求和会就韩国独立作出决议。金奎植以韩国临时政府及1800万人民的名义，向巴黎和会递交了《要求摆脱日本统治和使韩国成为独立国家请愿书》，并向驻巴黎的西方外交机构、欧洲各大报章、法国各公团及朝野名流广为散发。

朝鲜人民的要求得到了中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4月5日，广东康基镐等311人致电北京政府，将朝鲜比做“东方之巴尔干”，认为“此问题解决之前，永久和平不能来也”，要求饬令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朝鲜独立问题。在北京的中国全国各界联合会也发表《援助韩人通电》，指出“中国对韩国独立有援助之必要，且有援助之义务”，“韩国独立非排日问题，乃生存问题，乃东亚及世界问题”。

7日 中国国民党人在上海策划组织反日示威游行，旅沪韩侨积极参加。双方并召开中韩联合抗日会议，中方人士声明支持韩民族的独立运动。

同日，上海市民召开大会，纪念“五七”国耻4周年，韩侨以青年独立团名义，向大会递交反日文书，并有人参加大会。

25日 韩国独立运动领袖安昌浩自美国抵达上海，负责起草《临时宪法》及制定联通制，颁布内外；设置史料编纂部，历述韩日交涉由来、独立运动现状及日人虐杀之蛮行，准备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并促成了上海、汉城、海参崴（即今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三个临时政府的合并。

是月 朝鲜青年团在旅沪民团事务所举行茶话会，声援上海学生及各界举行“五四”反日示威运动。该团团长金鼎穆称：大韩国人口有2000万，而迁入朝鲜的日本鬼子现在只不过是30万，70个大韩人对付1个日本鬼子，以这样的比例抗击敌人，根本不用害怕，希望今后直接或间接地多给我们援助，以实现我们的理想。

六 月

△韩国志士金声报、李英烈等在上海长滨路爱仁里创办“救国冒险团”，从事反日斗争。

△此前4月，俄国人谢麦施科（Semeshko）、霍多洛夫、克拉辛（Klassing）和托尔斯托夫（Tolstoff；上校）一行四人乘俄国义勇船队的“本萨（Penza）”号船由海参崴来到上海。是月，谢麦施科在上海创办了一份俄文日报，名称是《上海新闻》。谢麦施科，原在俄国曾是一位东正教牧师，因酗酒被教会解职后成为一家社会主义报刊的记者。沙皇政府曾以“蛊惑煽动”罪名将他逮捕。他所创办的《上海新闻》以进步姿态出现，申明要“为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的俄国侨民提供一份高质量的独立、进步、民主和报道公正的综合性报纸”。该报的一篇文章嘲讽上海租界警方捕风捉影地把那些申请救济金、同公司发生争执、没能执行合同等的俄国侨民

都当作布尔什维克。《上海新闻》一出现，便不能见容于当局。在公共租界警方的压力下，报社立即关闭，连报纸创刊号也被禁止出售。

与谢麦施科同来上海的其他三人：霍多洛夫到上海后，曾在稍后谢麦施科创办的《上海俄文生活报》工作。他于1886年生于南俄重镇敖德萨。他从学生时代起便投身于反对沙皇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于敖德萨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曾在一段时期内任出庭律师。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同年9月赴远东前线，经伯力到海参崴，在那里主编刊物《遥远的边陲》。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很快转而拥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方针政策，并为苏维埃新政权工作。

克拉辛则被视为“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他在上海从事教学时向学生们宣讲布尔什维主义。是年夏，他曾接待因在日本宣传布尔什维主义被驱逐来沪的托宾森夫妇，而托宾森据说是一名重要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弟弟。后来，克拉辛在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工作。

托尔斯托夫后来在上海与共产国际驻中国联络员维里杰有密切联系，并且据说曾任苏俄驻沪军事代表，负责动员在上海的原沙俄军官返回祖国，他和谢麦施科都于1923年从苏俄驻中国特命全权代表越飞处领取了大笔活动经费。

夏

俄共（布）老党员、著名布尔什维克和后来成为联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负责人的布尔特曼，从外国干涉者占领下的海参崴先后秘密来到哈尔滨和天津，同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进行接触，特别是会见了李大钊并与他建立了某些联系。李大钊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工会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

八 月

7日 是日至11日,《晨报》副刊连载了“五四”运动健将、《新潮》主编罗家伦用“毅”的笔名翻译的共产国际宣言,题目是“新共产党宣言”。由于当时国内报刊对于国际新闻或仰给于外国通讯社或译自外报,故究竟是谁向他提供了“共产国际宣言”的英文通讯稿或载有该宣言的外国报刊?1943年王若飞在延安一次干部会上的报告中曾讲到:“1919年共产国际就派人到中国来了,起初是苏联华俄通讯社社长……”这就明确指出苏俄的通讯社长1919年就到了中国。但这一说法由于长期没有发现旁证而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甚至受到质疑。李丹阳、刘建一经过考证认为,供稿者很可能就是王若飞忆述的1919年被派来华从事宣传和组党工作的华俄通讯社社长即霍多洛夫^①。

12日 是年金九来华。是日,金九任韩国临时政府内务部警务局长。金九,1876年生,早年即参加抗日运动,曾三次被捕。

九 月

8日 韩国志士金炎、金浩平和中国国民党人在上海法租界举行秘密会议,讨论开展反日革命运动。

21日 谢麦施科在上海创办了《上海俄文生活报》,并向上海有关当局正式注册。该刊为周刊,使用的文字是俄文,主要的宣传对象是俄侨,也包括白俄。

27日 秘密来到上海的韩国志士安根生在上海法租界渔

^① 李丹阳、刘建一:《霍·多洛夫与苏俄在华最早设立的电讯社》,《民国档案》2001年第三期。

阳里召集秘密会议，参加者有朝鲜人50多名、西洋人3名、中国人10多名，讨论开展反日斗争事宜。

是月 流亡上海的朝鲜志士各派系实现了以韩国临时政府为主体的合并统一。趁着此机会，组建了第二届临时政府，由李承晚任大统领，李东辉为国务总理。由于李承晚身在美国只是挂名而已，被国内外各方尊为“革命巨子”的内务总长安昌浩，成了上海临时政府的实际主持人。这样，以上海为中心，韩国独立运动第一次走向初步的统一。而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日后也就逐渐成为韩国独立运动正统的标志。据统计，当时支持它的韩国独立运动团体至少有22个，其中东北和远东11个，上海8个，京津地区3个。

十月

10日 韩国志士王觉民在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发表演说。内称：“朝鲜亡国，原因虽非一端，择其重要者言之，殷富者平日不知爱国，一也；权奸当国，利令智昏，为虎作伥，引狼入室，二也”，劝告中国人以朝鲜为殷鉴，“人死不可复生，亡国亦难存在，不如乘未亡之前，早筹救亡之策”。

是月 韩国志士李圭、赵东植、李东柱等在中国东北安图县岛屿创办“大韩正义军政司”，领导韩民反日斗争。

十一月

9日 金若山和石正（即尹世胄）、梁健浩、韩凤根、韩凤仁、金玉、姜世宇、李成宇、徐相洛、权俊、申哲休、郭在骥、梁东宣共13人在吉林城巴虎门外某中国人家秘密集会，决定成立以实施暗杀手段为主的反日独立运动团体“朝鲜义烈团”。

朝鲜义烈团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其初期纲领是

“驱逐倭寇，光复祖国，打破阶级，平均地权”。以后，义烈团的纲领经修改扩充为18条，不仅规定了义烈团当前的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目标，而且规定了朝鲜独立后新国家政权的施政纲领，这个纲领尤其注意代表和保护朝鲜工农阶级的利益。

朝鲜义烈团还规定了“五破坏”和“七可杀”的行动目标。所谓“五破坏”，是指破坏朝鲜各警察署、朝鲜总督府、东洋拓殖会社、《每日申报》社、日本其他行政机关等；所谓“七可杀”，是指暗杀朝鲜总督以下高官、日本军部首脑、台湾总督、卖国贼、亲日派巨头、敌探、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绅等。

金若山被推举为朝鲜义烈团团长。金若山，1898年3月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的一个农家。原名金元凤，号若山，曾用化名崔林、陈国斌等。抗日战争时期，他常常使用金若山的名字于内外各种场合，使人们往往只记其号而不记其名。1916年来华，1918年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

在金若山的领导下，朝鲜义烈团团员们经常携带武器、炸药，潜行在朝鲜、中国、日本的各大城市，实施对于目标的攻击，搅得日本侵略者不得安宁。

是月 韩国志士安秉钻、金承万、吴东振等在中国东北宽甸县创建“大韩青年团联合会”，领导韩民反日复国运动。

十二月

12日 北京政府采取积极反苏立场，致电新疆督办杨增新称：“‘过激派’声势渐大，各国有与谋和之意，望酌度边情，妥为对付。”又称：“对俄国方针，院部联席会议决定联络民主党，严防‘过激党’，分电各边照行。”^①

21日 韩国志士吕运亨经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藤田陪

^① 这里“过激派”、“过激党”均指俄国布尔什维克。

同从上海赴日活动，曾会见日本拓殖局局长官古贺、陆军大臣田中、政务总监永野、宫内大臣床次、递信大臣野田等，说明韩国独立运动之真相以及韩人独立之主张。

27日 吕运亨应日本记者和平协会邀请在日本帝国饭店发表演说，说明韩国独立运动发生之经过，宣布民族之福利、日本之信义、东洋之平和、贡献世界之文明为韩国独立运动四大主张，声明“日韩合并决非由我民族之意思”，“实为韩人之殃祸与羞耻也，东洋之患乱猜疑由此而生”，希望日本能够“悔改”等。

29日 吕运亨返回上海。吕氏的日本之行引起日本贵族院对于内阁的弹劾，几致内阁动摇。

是 年

△韩国志士赵秉準、金承学、方雨龙等在绥远包头县创办“义民团”，领导韩民反日斗争。

同年，韩国志士李永柱、高仁植、金洛杰等在中国东北长白县八道沟创办“大韩独立军备团”，领导韩民反日斗争。

△韩国志士在上海发行《独立报》，宣传反日复国思想。

△朝鲜志士张明为寻求民族解放的真理，毅然渡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张明，化名金山、刘清华、刘汉平、开木仨、刘铁庵、刘寒三、韩国刘等，笔名张北星、北星等。1905年3月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来到中国时仅15岁。

△长期以来，中共党史学界在述及共产国际与中国先进分子建立联系并帮助他们组党的过程时，往往把1920年春维经斯基(G·Voitinsky)的使华作为开端，但实际上，此前共产国际就已经开始在华进行组党活动了。此前1918年6月26日李东辉于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成立韩人社会党后于是年8月到上海，参加韩国临时政府的组建工作，该组织的重心也移至上海。8月5日，该党